

领导参阅

本期要目

● 理论专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彰显“两个结合”的鲜明特色
毛泽东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

● 党建论坛

锤炼品德修为 坚持修身立德
学习“不偷、不装、不吹”的老老实实作风

● 党史钩沉

大别山区的剿匪斗争
延安整风时期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

● 热点聚焦

毛泽东同志的独立自主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 系统动态

● 点滴悦读

《周易》治世思想的重重境界

2024年第1期

(总第215期)

2024年1月16日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
(安徽行政学院)

图书和文化馆

目 录

● 理论专稿

-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彰显“两个结合”的鲜明特色..... 崔海燕（1）
毛泽东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 周锦涛 谭潇（7）

● 党建论坛

- 锤炼品德修为 坚持修身立德..... 张国祚（13）
学习“不偷、不装、不吹”的老老实实作风..... 张丽（16）

● 党史钩沉

- 大别山区的剿匪斗争..... 胡遵远（21）
延安整风时期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 姜润彬（26）

● 热点聚焦

- 毛泽东同志的独立自主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杨凤城（30）

● 系统动态

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 中国应急管理创新论坛（2023）暨中国应急管理学会智库论坛在京召开
.....（37）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第三届中共党史高端论坛

- 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深化新时代党的历史与经验研究..... 陈杰（40）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感受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实践

- 北京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第65期中青一班赴门头沟开展党日活动
.....（4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要闻.....（45）

● 点滴悦读

- 《周易》治世思想的重重境界..... 刘震（51）

● 图书推介

理论专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彰显“两个结合”的鲜明特色

2021 年 6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既植根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又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指导下，立足中国国情，浸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精髓，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彰显出独特制度优势和强大生命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政治创造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形成于近代政治道路的实践探索，植根于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党情与国情，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内在演进的必然选择。

统一战线是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面临着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即反帝反封建。然而，当时的革命力量——特别是无产阶级力量相对薄弱，这一历史事实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想要赢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就必须积极利用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采取合作型的政党组织形态。1923 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 and 革命形势，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和发展国民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以后，社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建立自己的党派和组织，积极支持

和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参与民主联合政府的活动，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孕育了组织基础。在陕北革命根据地采取“三三制”原则，“孤立顽固势力，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积极探索。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未来国家治理体系中构建新型政党关系的构想，“五一口号”迅速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与支持，促进了当时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由“中间道路”向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转变。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公开地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建设奠定了基础。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正式确立。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提供制度支撑。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稳固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虽受到一定阻碍和冲击，但仍克服了重重困难，并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新的发展局面。首先，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参政党理论。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首次提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1986年4月，中共中央下发通知，又一次明确指出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198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1989〕14号文件首次提出了“参政党”概念，从国家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高度，对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多党合作中的地位给予明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走上了制度化轨道。其次，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八字方针”的基础上，加入“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将其拓展为十六字，“十六字方针”成为引领多党合作不断发展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原则，为坚持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方针正式确立。最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向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发展。中共中央相继出台文件，先后制定一系列政策，明确了民主党派参政党的政治地位，并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不断探索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规范化、程序化，充分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和历史自信。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有着共同的价值基础，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维度，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转提供动力与机制，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为参政党履职尽责、树立政治形象提供了广阔舞台。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胸怀“国之大者”，积极履行职责，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专业领域，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彰显特色优势、贡献智慧力量、发挥独特作用。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充分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效能优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传承的“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等思想，既符合

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有其独特的内在文化根基和时代价值，充分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民族性特征，体现着中国创造和中国智慧，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现唯物辩证法矛盾对立统一观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文化精髓的结合。和合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和谐共存、协调稳定，反对分裂和冲突，这既符合唯物辩证法矛盾对立统一观点，也彰显中华民族“以和为贵”“德莫大于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贵和尚中”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是传承了这种“贵和尚中”的文化传统，以和合文化作根基，在尊重多样性、矛盾和差异的基础上追求动态统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上，形成了以合作、协商代替对立、争斗的和谐政党关系，既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自觉接受共产党的政治领导、长期共存、平等合作、民主协商的“和”，又有作为在法律面前平等独立的各政党互相监督的“不同”，这种“和而不同”的运行方式，既体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一致性，又关注了各方面、各阶层群众的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蕴涵着中华民族包容和合智慧的精髓，有利于集中意见建议，有利于在求同存异中兼容并蓄，有利于推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促进执政能力和水平的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至今，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政治前提，以民主协商为行动策略，在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出台前必事先征求各民主党派意见和建议，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现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理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提出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人类美好生活目标而奋斗，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思想具有一致性。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民本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早在战国时期，《孟子》一书

就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中也提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早已深深植入到中国政治文化的骨髓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直秉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展现出“天下为公”思想的当代传承。坚持“天下为公”不仅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中，也体现在政党制度的体制机制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体现的“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传承、创新了传统民本思想，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进行的升华，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拓宽了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保证了不同阶层利益表达和政治诉求以及人民的参与、表达和监督等多项权利，它使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将人生价值与民族荣辱、国家兴衰相关联，形成了“参政为民”的良好局面。今天，“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的价值共识已经在国家利益基础上实现了政治理想的融合共生。

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充分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

历史与实践证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模式。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要加强对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政治领导，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过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有效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和呼声愿望。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要立足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担负起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的政治责任，以“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情怀，不断提高履职能力，认真做好调查研究，紧紧围绕党和国家

方针政策的制定和重大战略决策部署的实施献计出力。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要充分发挥界别特色和智力优势，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基本职能，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和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充分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效能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履行职能。”充分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不仅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指导实践，还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汲取中华文明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植根的文化沃土，是中国发展进步的突出优势。我们要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更加规范有序、生动活泼，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力量。

作者：崔海燕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4-01-03

毛泽东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前驱先路、筚路蓝缕，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创造性思想和前瞻性构想，在实践中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根本条件。回顾和总结毛泽东同志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作出的独特贡献，对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破局：祛魅西方现代化的迷思

18 世纪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以新兴工业文明为主的欧美国家逐渐走到了人类文明的前列，资本主导下的西方现代化对外大肆殖民扩张，使当时封闭落后的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由于君主专制王朝的腐败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探索符合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过程中，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却多抱憾而终，农民起义、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种种救国方案相继失败。一时间，“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摆在了每个中国人面前，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正肇始于此。

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是社会主义。近代以来中国各阶级进行的现代化探索接连失败的历史教训与中国的特殊国情使毛泽东同志逐渐认识到，对当时的中国而言，直接嫁接西方现代化的理念与模式并无用处。同时，马克

思列宁主义在华的传播使他了解到西方资本主义物化立场的伪文明性和社会主义人民立场的优越性。因此，毛泽东同志在纷然杂陈的诸多思潮中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立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认定了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鉴于对“落后就要挨打”的清醒认识，他认为不触动旧社会的根基就无独立自主的现代化中国可言，必须效仿俄国十月革命，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基于这一理念，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然而，面对积弊已久的国情和强大的敌对力量，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一度简单套用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从革命斗争失误的教训中，毛泽东同志深刻领悟到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结合。由此，他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特色革命的新道路。经过革命实践的检验和系统深入的思考，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框架，系统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深刻解答了如何开展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命题，初步勾勒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图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打破欧美现代化道路放之四海而皆准以及盲目照搬苏俄现代化革命模式的迷思，坚定不移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并将党锻造成为领导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建成一支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领导党和人民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成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拓新：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近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个历史目标的胜利完成。在成功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后，中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首要问题。毛泽东同志清楚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他将中国的革命事业分为两部分：首先，要通过无产阶级领导下发动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消除束缚中国发展的“三座大山”，基本规避外部不良因素。其次，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旧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等沉疴除尽，才能真正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跨越，为现代化建设营造稳定的制度环境。

新中国首先在政治制度方面展开对旧的上层建筑的革除。根据毛泽东同志对新中国现代化模式具体内容的构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国家先后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适合中国现代化实际的政治制度架构。其中，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之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伟大创造，反映了党在恢复国民经济过程中努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期望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群众路线。在经济方面，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期，毛泽东同志于 1953 年 6 月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

容，即“一化三改”，旨在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扫除制度层面和社会结构上的障碍。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这一时期开展的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之后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在文化方面，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文化现代化作为十分紧迫的任务，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党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的探索逐步深化，毛泽东同志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从制度规范的角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整个国家建设的指导地位。为了促进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他又在1956年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现代化由被动发展转变为在一个独立政权领导下的、主动发展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与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升为国家意志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通过顶层设计、长期规划、重点部署等方式为正确把握我国现代化事业全局提供了科学的战略指导、优越的政治条件和制度保障，使中国式现代化步入平稳发展的新阶段。

奠基：擘画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蓝图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在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超越中深入思考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通过将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在不断总结现代化建设规律性认识的过程中为中国式现代化擘画了发展蓝图。

一段时间以来，或受20世纪30年代“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论战的影响，抑或对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的仿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多以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为核心。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虽使经济得到飞跃式发展，却也在模仿苏联的过程中暴露了诸多问题。1955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以苏为鉴”，苏共二十大的揭露更使他深刻反思起苏联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弊端——整体上偏重重工业发展，轻视农业与轻工业。1956年起，毛泽东同志相继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超越苏联模式的标志性成果，开始带领全党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在“第二次结合”原则指导下，他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构想：一是按照优先发展重工业、兼顾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同时并举的思想，走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二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这是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问题；三是遵循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方针，如同时发挥中央与地方、工农群众与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毛泽东同志所勾勒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在关键时刻掌握了历史主动权，冲破了苏联模式的禁锢，为真正走上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探索道路奠定了基础。

尽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中经历了弯路挫折，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自主总结并不断纠正实践中的冒进错误。基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艰巨性与长期性的理性认识，以及对急于求成造成的严重挫折的深刻反思，毛泽东同志深化了对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规

律的认识：一是目标分解更为合理，将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由单一工业发展转变为“四个现代化”；二是速度规模趋向切实，从“赶超英美”调整为两步走战略。有了这样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思想引导，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逐渐摆脱了教条主义、冒进主义，并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产业结构与经济模式，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也为正确把握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张力提供了经验教训。

总之，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史亦是一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阶史。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贯穿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始终，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推进和拓展的理论起点和逻辑起点，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和历史根基。从理论上讲，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从根本上破除了“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思维定式，其伟大思想作为对实践中正反两面经验总结的理性认知震古烁今，其中蕴含的独立自主、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至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实践上看，毛泽东同志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过程中领导党和人民找到了社会主义这一正确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为新时代探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思想指导、领导核心、物质基础、政治保障等方面具有深远意义。

作者：周锦涛 谭潇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23-12-25

党建论坛

锤炼品德修为 坚持修身立德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道德建设，尤其重视干部队伍的道德建设，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政德，就是为政之德、从政之德、执政之德。对于青年干部来说，修身立德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只有锤炼高尚品德、培养良好修为，才能以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在人生道路上立得住、站得直、走得稳、行得远。

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学生时，深情讲述青年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更是寄予厚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由此可见，青年承载着时代的使命和担当。青年党员干部是青年中的佼佼者和榜样骨干，更要不断锤炼道德修为，练就过硬本领，争做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的干部。

筑牢信仰之基

在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上，有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怀着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浴血奋斗、大义凛然、视死如归。28岁的夏明翰镇定自若地在刑场上写下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26岁的陈然面对敌人的诱惑写下《我的“自白”书》：“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方志敏面对敌人死亡的威胁，写下“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从小变大、从弱变强，最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起新中国，离不开无数先烈信仰的伟力。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信仰教育，他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如果信仰不够坚定，理想信念模糊，就容易心为物役、修身不严、德不配位，甚至背叛初心使命，落得可悲可耻的下场。青年党员干部涵养政德，只有以先辈先烈为镜、以反面典型为戒，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

深悟理论之要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因此，第一位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

理论联系实际，这是我们党对理论武装工作的一般要求。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进一步指明了加强理论武装工作的着力点。

真学真懂真信，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对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要求，但落脚点应该在“用”上。必须坚持好运用好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并自觉运用这些立场观点方法改造主观世界，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做到知行合一

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

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毛泽东则概括出以实践为主导认识的规律性。要在实践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使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只有实践才能完成知行合一。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我们要在学史明理、增信、崇德、力行中加强自我修炼。同时，我们要做到尊古而不复古，守正而不守旧，对于优秀传统文化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修身立德也是如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自觉加强政治历练，接受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淬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使自己的政治能力同担任的工作职责相匹配。要立志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险，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年轻干部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险，才能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建功立业，同时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真正把高尚的政德落到实处。面对艰苦，面对“最硬的骨头”，我们要迎难而上；面对老百姓的“急难愁盼”，我们要感同身受，敢于担当作为。

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肯定还有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困难风险挑战。我们在坚定自信的同时强化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修身立德意识，我们的党就会更加有战斗力。只有我们坚定信仰、深悟党的创新理论、深植家国情怀、深修政治品格、涵养高尚情操、追求崇高境界，踏踏实实，稳步向前，才能真正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时代重任。

作者：张国祚 来源：《光明日报》 2023-12-16

学习“不偷、不装、不吹”的老老实实作风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口头政治报告的最后一个问题提出：“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讲真话，不光每个人都应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如此。讲真话，就是要求我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态度，学习毛泽东提出的“不偷、不装、不吹”老老实实的作风。

何谓“不偷、不装、不吹”

什么叫不偷？偷就是偷东西，这里毛泽东提到的“偷”就是抄袭。不偷就是不要抄袭。不是自己的著作，将其调换几个名词，写上自己的名字进行出版，这就是偷，这就是贼，这就是不诚实的表现。毛泽东说：“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刘少奇讲的就是刘少奇讲的，徐老讲的就是徐老讲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都不要偷。”我们经常看到毛泽东引经据典，经常会提到哪本书里的内容和哪个人讲的话。这种尊重知识、尊重原创的态度是毛泽东的文风，也是毛泽东党性修养的一个体现。

什么是不装？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毛泽东引用孔子的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就是不装。毛泽东举了一个诙谐的例子，“爱装的人，是他母亲生下他来就要他装的？他母亲怀他在肚子里就在观音菩萨面前发誓、许愿，一定要生一个会装的儿子？当然不是”。“不知道不要紧，知道得少不要紧，即使对马列主义知道得很少、马列的书读得很少也不要紧，知道多少就是多少”。毛泽东推荐党员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这些书既有历史，又有理论。这五本书分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

《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到，“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提到，“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毛泽东这种加强学习的方法，始终保持谦虚的态度，提出了党员达到“知”的途径。他以身作则，真正地“活到老，学到老”。

什么是不吹？吹就是吹牛皮。不吹就是报实数，“实报实销”。毛泽东提到，“有的同志在发言中说，内战时期养成了一种习惯，向上级报告工作时，要讲好一点，夸大一点，才像样子。其实这不解决任何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整个人民工作的一部分，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们都有份，人民都有份……延安是全国人民的”。“实报实销”，要求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要把自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驴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毛泽东的“实报实销”，不仅事关党内的事情，而且也是关乎人民的事情。毛泽东提出公开自己领导工作的缺点，实行人民监督，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到，“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

实行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也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

党内通过发扬“不偷、不装、不吹”的作风，讲真话，党的作风就更加纯洁了。毛泽东举了一个例子，“现在发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

“不偷、不装、不吹”的问题引起了七大参会党员干部的讨论。张闻天对照这个问题，做了深刻的检讨，剖析自己的思想，他说：“我曾经在某一个问题上自以为我了解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后来一次二次的反复证明，我的了解是不对的。我曾经在某一种作风上，自以为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作风，但后来无数次的证明，我并没有学到多少”，“过去我们那种以不知为知，以假知为真知，以人知为我知，以小知为大知的，不做精密的调查研究的夸夸其谈的作风，实在不但害己，而且害人”。“一种伟大的思想与作风的学习，必须要有长期的思想上的奋勉，及长期的实际工作中的锻炼，才能慢慢的有所进步”。张闻天深刻地认识到必须戒骄戒躁，学习毛泽东的思想作风，真正做到言行一致。李富春提到，“我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小资产阶级的脑筋，归根结底还是毛主席说的，要老老实实，要采取老实的态度，实事求是，深思熟虑。要奉行毛主席讲的‘不吹，不装，不偷’”，“老老实实就要不吹，不偷，不装。不管你陪吹也好，小装也好，都算是偷、吹、装，都是要不得的”。现在，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将这种老老实实的作风贯彻下去，像老一辈革命家那样深刻剖析自己，才能在学习和工作中取得更大的进步。

如何做到“不偷、不装、不吹”

今天，虽然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偷、装、吹”的现象依然存在，我们更需要讲真话，发扬“不偷、不装、不吹”的老老实实作风，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读书求知、求真务实。

不偷，就要遵守学术规范。历来都有文抄公，这种文贼为人所不齿。这一现象在当今社会仍层出不穷，不少人将他人作品盗为己用，学术造假，以此达到“装”和“吹”的资本，来攫取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今天我们要“不偷”，就得在引用中老老实实在地标明出处，遵守学术规范，恪守学术良知。文风正，则自身立，作风正。正如毛泽东提到的“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这也需要我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打击各种抄袭行为。只要人人“不偷”，营造出健康的创作环境，大家才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涌现出更多的创新成果。

不装，就要多读书，求真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去科学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精髓，而是教条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不正确的学习态度。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学习就必须求真学问，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不能满足于碎片化的信息、快餐化的知识。要通过学习知识，掌握事物发展规律，通

晓天下道理，丰富学识，增长见识。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只有在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中才能充分发掘出来”。我们要求真知，就要树立终身学习的志向，认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不吹，就要求真务实，言行一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千万不能夸夸其谈、陷于‘客里空’。”不能搞形式主义，“有的明知报上来的是假情况、假数字、假典型，也听之任之，甚至通过挖空心思造假来粉饰太平”。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到文艺批评的问题，“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

《中国共产党章程》提到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要“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不吹，就要做到言行一致，经得起人民的监督、历史的检验。

“不偷、不装、不吹”，要求我们采取谦虚谨慎的态度，戒骄戒躁，向一切内行学习，甘当人民群众的小学生，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愿意听真话，才能鼓励讲真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人们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的人面前，才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乐于讲真话。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欢迎和鼓励别人讲真话”。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要继承发扬“不偷、不装、不吹”的老老实实作风，才能创造出实实在在的业绩。

作者：张丽 来源：《学习时报》 2023-12-26

党史钩沉

大别山区的剿匪斗争

1949年8月，为迅速消灭大别山区的匪患，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华中、华东两大军区密切协同，由华中军区牵头，从第三、第四野战军和湖北、河南、皖北三个军区中抽调足够兵力，对大别山地区的土匪进行联合会剿。经过约半年的战斗，到1950年2月，鄂豫边区军民共消灭武装匪特1.5万余人，平息了大别山区的匪患，肃清了这一地区的残余反动势力，维护了社会秩序，保卫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皖北剿匪，旗开得胜

1949年渡江战役后，人民解放军以风卷残云之势粉碎各地国民党军的抵抗，迅速向东南、中南、西北、西南进军。蒋介石一面匆忙撤逃台湾，一面在各地潜留大批特务，开辟所谓“第二战场”。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解放军主力部队挺进大别山，皖西北地区基本解放，新生的人民政权已经在大部分地区建立起来。但一些国民党特务盘踞在边远地区，收拢国民党军政残余势力，勾结当地各种反动力量，推行所谓“游击计划”，对新解放区进行各种阴谋破坏，妄图以此阻挠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与建设。

1949年5月，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派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师师长汪宪携电台潜入大别山成立“国民党华中剿总鄂豫皖自卫军司令部”，汪宪任司令，樊迅、袁成英任副司令。汪宪等到大别山后，收买网罗反动势力，将鄂豫皖三省边界大小土匪编成14个“支队”（约2万人），活动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边远山区。他们打家劫舍，袭击解放军小部队和公安干警，

攻打基层人民政权，残杀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气焰十分嚣张。

为了有力地打击土匪势力，解放军皖西军区、皖北军区先后组织剿匪指挥部，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全面开展剿匪斗争。1949年5月，解放军皖北军区、皖北行政公署发布《联合布告》，对土匪进行政治瓦解。《联合布告》指出：“对土匪中的首要分子，务必归案法办，如能率众投降，交出武器，准予将功折罪，保证其生命安全，从轻处理，或免于处分；对于胁从分子，只要脱离匪帮，交出武器，改恶从善，准予回家生产，不咎既往；凡怙恶不悛，继续祸害人民的土匪，必须坚决消灭，并严惩首恶，决不姑息。各地人民如能缉拿匪首、密报匪情，检举土匪隐藏的武器，协助剿匪有功者，分别予以奖赏。如有通藏匪、庇匪行为的，一律严办。”同时，为了便于指挥，皖北军区、皖北行政公署决定成立4个剿匪指挥部。6月1日，在阜阳成立第一剿匪指挥部，在六安成立第二剿匪指挥部，在安庆成立第三剿匪指挥部，在宿县成立第四剿匪指挥部。对于匪势猖獗而剿匪力量又很薄弱的肥西县，由皖北军区警卫团一部与肥西独立团组成剿匪指挥部，其他匪患严重的县份，也相继建立剿匪指挥机构。

6月1日起，各地开始行动，对匪帮全面清剿。第一剿匪指挥部与第四剿匪指挥部一面镇压反动会道门暴乱，一面驱散或歼灭平原地区的股匪。第三剿匪指挥部在岳(西)、霍(山)、舒(城)交界处，采取奔袭、分路合击等战术，歼灭部分土匪。第二剿匪指挥部在大别山区清剿。至6月底，消灭土匪2000余人。7月，解放军部队、地方政府及公安部门派出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捕捉散匪，收缴其武器，集中兵力清剿顽固不化的土匪，稳固地控制了麻埠、流波、叶集等地，将大批土匪压缩在金寨山区内，使其不敢外出。

鄂豫皖三省的联合清剿顺利展开

解放军在皖北地区的剿匪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又集中力量，对藏身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土匪发起攻势。

1949年8月上旬，解放军华中军区召开鄂豫皖三省剿匪会议，研究剿匪方针和步骤。会议确定：首先以军事打击为主，有目标、有重点地奔袭合击，不分界线，坚决歼灭流窜之匪，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控制点线、四出清剿，到处堵击截击。其次开展政治攻势，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进行反霸斗争。在城市亦加强警备，设立岗哨，盘查可疑人员，登记户口，捉拿潜藏匪特，配合农村清剿。会议决定成立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设在湖北罗田县），统一指挥三省剿匪部队；设东线、西线、南线3个剿匪指挥部。此间，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也召开剿匪会议，部署剿匪，派野战军一部到皖北参战。

8月31日，中共皖北区委印发《关于肃清大别山土匪及开辟山区工作的决定》。9月1日，皖北行署公安局向全区公安机关发出《关于加强剿匪时期公安工作的指示》，要求公安机关根据中央指示和区党委制定的工作方针，配合军事部门，在皖北境内坚决、彻底地消灭股匪，肃清散匪，收尽匪枪，捕尽匪首；搜集匪情，供给剿匪部队；发现抢劫，迅速破案；利用关系，开展对土匪的内线瓦解工作，打击操纵土匪的特务，制止武装暴乱事件发生。9月9日，皖北军区、皖北行政公署再次发出《联合布告》，强调以最大决心加强剿匪，一面派出劲旅，全面部署；一面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城市与农村、平原与山区、前方与后方、军队与人民全体动员，将匪患彻底清除。

一切准备就绪后，解放军剿匪部队于9月5日向大别山区的匪帮发起全

面进攻：驻皖北解放军一部，皖北军区所属部队及当地公安机关、公安部队协同作战，向盘踞在大别山区的土匪开展清剿。皖北剿匪部队由六安、白塔畈方向，湖北剿匪部队由麻城、罗田、吴山方向，河南剿匪部队由商城、南溪方向，对安徽金寨及其以南地区进行合击。首先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合击土匪的指挥机关，消灭其有生力量，在战术运用上，采取三线纵深配合：第一线为进剿、会剿部队，分进合击匪中心区，打乱其指挥系统；第二线为驻剿、堵截部队，控制要点及重要城镇，安设据点，协同第一线部队合击、堵击、截击；第三线为封锁部队，以县区乡地方武装为主，组织群众联防，设岗盘查，防止土匪逃窜。

剿匪部队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土匪来不及抵抗便闻风而逃。剿匪部队乘胜追击，在半个月时间内，共歼匪约 1500 人。到 9 月底，土匪大别山最高指挥机关“鄂豫皖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及其所属淮河、立煌及二、四、六、十等 6 个支队、3 个指挥所、3 个县政府被摧毁，土匪近万人或被俘、或投降。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残匪只得逃入深山，暂且苟延残喘。

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密切结合

9 月下旬的一天，在金寨西南帽顶山一带驻剿的三野七十一师二一三团一营三连经过周密访查，掌握了匪首汪宪藏身处的情况，并于 9 月 30 日在帽顶山搜山，在狮子洞将匪首汪宪及其党羽一举擒获。根据汪宪提供的线索，10 月 2 日，又分别活捉了匪首袁成英和樊迅。至此，国民党“鄂豫皖自卫军”主要首领全部被擒，土匪的指挥机关被摧毁。

10 月 2 日至 5 日，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召开第二次剿匪工作会议，总结经验。会议根据山区残匪采取“变明为暗，化整为零，分散插枪，甚至假投降”等继续顽抗的新情况，确定下一步的剿匪总方针是：“应以全力结合

群众，以政攻为主，贯彻军事打击，继续歼灭股匪和大力开展进山驻剿、清剿、搜捕、瓦解散匪。”同时，剿匪指挥部号召各部队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彻底肃清残匪。

解放军剿匪部队即由重点清剿转为分兵驻剿，并与县区武装及民兵开展分区联防，实行内线控制要点，外线严密封锁，一处打响，各处支援，白天看烟，夜晚看火，发现匪踪，立即用“穷追不舍的战法”予以剿灭。各部队还抽调一批精干的指战员，采取以便衣治便衣、以分散治分散，以游击治游击的方法，深入乡镇村庄，探明匪情，然后深夜潜伏，拂晓包围，黎明进屋，发动突袭。10月，剿匪部队、公安机关等组成工作队，在各地群众的配合下开展大规模搜匪运动。

在对土匪持续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解放军剿匪部队还通过广泛宣传，迫使散匪丢掉幻想，放下武器，向人民政府投诚。在解放军剿匪部队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土匪有组织的抵抗迅速瓦解，纷纷下山缴械投诚。与此同时，解放军对少数冥顽不化、继续为敌的土匪，持续进行军事清剿，到11月底，基本肃清了百人以上的土匪。

12月10日，鄂豫皖边区召开第三次剿匪会议。会议要求各线剿匪部队“以深入发动与组织群众为主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组织生产，结合政攻开展清剿”。至1950年3月，鄂豫皖边区的剿匪战斗宣告结束。

作者：胡遵远 来源：《人民政协报》 2023-12-13

延安整风时期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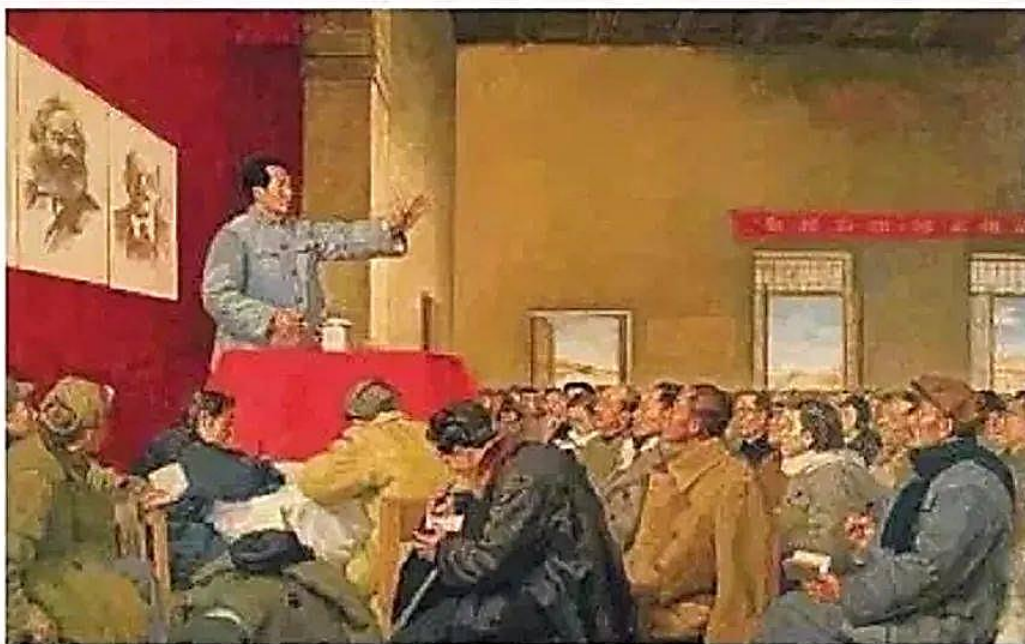
延安整风时期，我们党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员干部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对自身的错误思想和缺点进行深刻反思，净化思想灵魂、提升党性修养。其做法经验对继承和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不断推进党的建设仍有现实意义。

学习文件以提高思想认识。延安整风时期，党中央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的文件材料。1942年4月6日《解放日报》社论提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首要工作是把中央的文件多读几遍，多想几遍，要虚心学习，敢于认识自己，清算自己，要有决心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正确的人生观武装自己。组织学习中央指定的文件材料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前提条件和关键环节。《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明确规定：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



毛泽东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二十二个文件”，这些文件都是他亲自审定和编辑的。中央党校第一期整风学习中，党校一部的全体学员一遍接着一遍地读文件，联系自己的实际情况，不断进行思考和讨论。并且结合个人学习与集体讨论这两种方式，自由组织讨论会、交流会，随处可见党员

干部在讨论问题。如果有难以理解的地方，还可以在支部讨论。《解放日报》刊发了很多中央党校党员干部关于精读文件的文章。全体党员干部在认真学习文件的基础上，将自己的思想与党的历史、个人实际情况、实际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确保批评和自我批评取得扎实效果。



毛泽东作整风报告（油画）

领导干部带头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延安整风时期，党中央提出，领导干部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对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树立了好榜样。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探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在全党要进行一次思想的革命，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当众作自我批评，他指出土地革命后期的工作是路线错误，作为当时的负责人，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且自己具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过去对这一点的认识并不深刻。任弼时也在会议上检讨自己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提出当年在南雄召开的会议上对毛泽东认为苏区内部也能打仗的正确主张不是很认可。并指出当时毛泽东反

对本本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当时反对所谓的“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党的领导干部带头进行自我批评，是全党范围内实现批评和自我批评成功开展的关键所在。

联系实际进行自我检查反省。要揭露党员干部自身缺点和问题，就需要其联系实际积极开展自我检查和自我反省。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反省的过程，就是自我批评的过程。陈云指出：“我们共产党是一个郑重的党。考察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的标志之一，就是看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采取什么态度。如果他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敢于研究并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那他就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要善于作自我批评，就要联系我们党的历史、路线与政策，也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实际工作，进行自我检查与反省。1942年12月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要求每位同志必须对自己进行检查，做到三点：一是检查过去的工作，二是检查现在的工作，三是检查自己写过的作品或文件。比如，在工作方法上是否有“老一套”“打官腔”的现象；在笔记和发表文章中是否有言之无物、空洞抽象的问题，等等。



党中央要求党员干部，在前期学习文件的基础上，联系个人实际情况，写具有自我批评性质的个人反省笔记，并建立了抽查阅读党员干部笔记的制度。写反省笔记是整风时期开展自我批评的重要方法。张闻天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联系实际进行深刻地自我反省，指出遵义会议后“这个特殊的顺利环境，使我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到自己的严重错误。”只有联系实际，不断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反省，才能够真正发现和认识到自身的错误，自我批评才可以收到明显的效果。

发挥报纸对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用。我们党的报纸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平台。毛泽东指出：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他亲自领导了《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并题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标语。他指出，我们的报纸是党和人民的报纸，要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报纸批评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真正发挥报纸的批评作用。

1945年5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米脂生产领导须加强，县级干部不重视春耕》一文，中共西北局就此事给各级党委发出《发扬正确的自我批评》指示，并在《解放日报》刊登，指出“此文所指出的缺点，不仅存在于米脂县的个别干部中，而且在其他地区不少干部中亦严重存在。因此，希望各级党委注意研究，并以此作为在职干部学习的材料，具体检讨各地所属工作中的类似缺点，发扬正确的批评自我批评，以达教育干部、改进工作之目的。”在报纸上公开地开展批评，有利于党员干部及时发现和改正自身问题，不断改进工作，以及更好地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作者：姜润彬 来源：《学习时报》2021年05月28日

热点聚焦

毛泽东同志的独立自主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更是长期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推进的法宝。独立自主的核心要义，就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

—

独立自主既有马克思主义依据，又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渊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联合起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各国无产阶级“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指出，东方共产主义者要完成的任务特殊而艰巨，这些任务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自立自信自尊自强精神，是独立自主的民族传统文化“根脉”。

虽然如此，对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独立自主绝非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那样简单，而是经历了一个艰辛的认识、探索、深化和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讲过，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果，同时也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这种帮助在很多时候很多问题上表现为直接作决定、下命令。一方面，共产国际在促进中国共产党成长和进步方面作出了特有贡献；另一方面，又对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负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

毛泽东同志比较早地开始了独立自主的革命实践，比较早地产生了独立自主的意识。他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主力军地位的认识，对湖南等地农民运动的高度赞扬，尤其是带领秋收起义部队挺进井冈山就是明证。面对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面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以遵义会议为开端，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性日趋彰显和坚定。在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与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国共两党的复杂关系中，在处理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中，在处理与美、英、苏等大国的关系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累了丰富的独立自主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奉行独立自主基础上的“一边倒”外交方针，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以壮大国际共产主义力量、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的同时，在接受苏联援助尤其是新技术援助的同时，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独立自主地处理内政外交事务，中国共产党不曾有过丝毫含糊、动摇，毛泽东同志的话掷地有声，“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

二

毛泽东同志的独立自主思想和精神首先体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上。走自己的路，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和实践的落脚点、根本点。正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毛泽东同志带领党和人民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而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则成

为毛泽东同志思考和探索的重心。他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对党的八大政治报告进行修改的时候，他写道：“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事实上，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报告或讲话便是“第二次结合”的典型体现。正是在这种探索和结合中，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新中国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基础，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没有像一些新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那样，虽然政治上宣布独立了，但经济上无法摆脱对原宗主国的依赖而不得不堕入依附性发展。

以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的独立自主成就为起点，在改革开放的创造性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得以创造。历史表明，道路决定命运。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是独立自主的根本和前提，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基本结论。新时代，党和人民需要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阔步前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够实现。

三

独立自主就要自力更生。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明确告诫全党：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伪封锁和国民党反共摩擦，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日益困难，毛泽东同志后来回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然而，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开展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同志等中央领导人带头参加劳动，八路军三五九旅创造了变荒山野岭的南泥湾为“陕北的好江南”的奇迹，谱写了一曲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壮丽凯歌。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党带领人民战胜严重困难、打败日本侵略者奠定了物质基础。

民主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同志同样强调要把经济发展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曾经给予中国经济和技术援助，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毛泽东同志认为这对我们有好处，能够激励我们独立自主地进行科技攻关，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他申明，“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正是在这一思想激励下，新中国成功研发“两弹一星”，实现了科技领域的自主突破，并由此带动了整个工业体系的建设。可以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国家经济建设路线。他鼓励创造创新，告诫人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新时代的中国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正在大步迈向创新型国家前列，已经成为并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技实力、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早已今非昔比，但是，在一些重要领域、关键技术方面仍然存在短板甚至被“卡脖子”。历史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丢掉幻想、坚定信心、自主研发，只有如此，才能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四

独立自主并非意味着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也不是盲目排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强调的是对外合作中的主动性与主导权，避免在合作中出现单向依赖，丧失发展的主动权。在不损害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对外经贸、技术合作是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能力的必要条件之一，尤其是在经济、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更为重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不仅积极发展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技术往来，而且想办法打破封锁，开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交往。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学习借鉴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在已有思想和实践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全方位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国外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

实现跨越式发展。新时代，我们需要继续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并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邯郸学步。只有扎根本国、独立自主，才最可靠，也最管用。

五

独立自主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离不开斗争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历史表明，党带领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和人民，无论敌人如何强大、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无畏惧、不怕牺牲、百折不挠。毛泽东同志曾写下这样的豪言壮语：“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他强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精神处处体现着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体现着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崇高气节。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封锁禁运和战争威胁，面对“老子党”、大国沙文主义的盛气凌人甚至陈兵边境，毛泽东同志更是表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他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在国际交往中对任何大国、强国、富国都不要有一点卑躬屈节的表现，也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这一敢于斗争的传统从未中断，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邓

小平同志明确表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

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斗争是一门艺术，需要注重策略方法。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包括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战略的高远性和战术的敏锐性，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善于抓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等等。新时代，我们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培养和保持顽强的斗争精神、坚强的斗争意志、高超的斗争本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的独立自主原则不能丢，中国人的脊梁不能弯。只要我们善于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时代特点，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让独立自主在新征程上焕发新的光芒。

我们党百余年的伟大历程证明，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作者：杨凤城 来源：《光明日报》 2023-12-26

系统动态

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中国应急管理创新论坛（2023）暨中国应急管理学会
智库论坛在京召开



12月18日，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中国应急管理创新论坛（2023）暨中国应急管理学会智库论坛”在京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中国应急管理学会具体承办，主题为“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龚维斌，中国应急管理学会会长洪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龚维斌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作出了战略部署。公共安全治理体系是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他强调，新时代完善公共安全体系，不断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一是要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二是要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三是要提升重点领域安全治理水平，四是要大力推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洪毅指出，中国应急管理学会是我国应急管理综合领域的国家级社会组织，有责任、也有能力，为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一是整合多方力量资源，强化智库引领功能；二是聚焦重点难点问题，联合开展科研攻关；三是健全成果转化机制，提升服务保障水平。

应急管理部原副部长、原国家减灾委秘书长郑国光，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国家实验室副主任余少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煤炭科工集团首席科学家王国法，生态环境部环境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研究员李天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南京大学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童星，应急管理部监测减灾司副司长袁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社会责任局副局长柳长森等领导嘉宾，先后发表了主旨演讲。

论坛分设了“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进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进一步提高应急管理能力”“‘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风险治理”“应急管理科技与应急产业发展”五个分论坛，同步还召开了“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期刊工作坊”。与会人员围绕上述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形成了广泛共识，取得了预期效果。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原副校长（副院长）、中国应急管理学会副会长李季，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原中央 610 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应急管理学会副会长徐海斌，四川省社科联主席、四川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中国应急管理学会副会长杨泉明，原公安部消防局政委、正军职少将、中国应急管理学会副会长王沁林，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应急管理学会副会长周国平，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教授、中国应急管理学会副会长马宝成，中国气象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国应急管理学会副会长沈晓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中国应急管理学会副会长钱建平出席了会议。

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应急管理相关司局负责同志，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各直属单位有关负责同志，部分省（市）党委、政府及应急管理相关机构实践工作者，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有关高校、科研院所和智库从事应急管理研究的专家学者，有关媒体代表，以及风险管理、应急产业、应急救援相关企业、社会团体、民间组织负责同志等，约 150 人参加此次论坛。

作者：李少阳 来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网 2023-12-2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第三届中共党史高端论坛 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深化新时代党的历史与经验研究

为进一步拓展、深化和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研究，12月16日上午，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主办的第三届中共党史高端论坛——“深化新时代党的历史与经验研究”理论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出席并致辞，原中央党校副教育长柳建辉，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中共党史研究》主编沈传宝，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阎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卢永平，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杨凤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传利，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赵朝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沈传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董洁先后发言。

李文堂在致辞中指出，新时代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个新时代也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历史时刻”。我们正经历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正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正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身处这样的时代，经历这样的“历史时刻”，思想家、历史学者当有强烈的时代意识与历史责任，做时代的参与者、见证者、记录者、书写者。目前新时代党史研究还处于新兴阶段，有深度的成果还不多，这与新时代已经呈现并将进一步呈现的历史地位不相匹配，需要从四个方面努力：一是厘清历史主题；二是拓展历史视野；三是增强系统思维；四是加强跨学科交流。

柳建辉指出，深化新时代党的历史与经验研究，既要从百年党史的整体角度展开，也应突出重点，把不同层次的历史经验讲深讲透，还要在总结经验不足的过程中展开对比研究。沈传宝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第三个历史决议、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等大量文献资料的出版，为深入研究新时代党史奠定了有利基础和条件。阎丽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跟历史步伐，对新时代党的历史方位作出清晰判断，从而更好地服务现实、服务未来。卢永平表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正确政治导向，挖掘好红色资源，研究好新时代党史，为文化润疆提供历史借鉴。杨凤城指出，研究新时代党的历史与经验，要从大历史观出发，把新时代党史放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中国近代史和百年党史的大视野中加以考察。王传利认为，党的历史发展是具有有机结构的统一体，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次进行深入考察。赵朝峰围绕为什么要研究、用什么方法研究和深入研究的着眼点谈了看法。沈传亮对比分析了新时代改革与新时期改革的异同及其内在联系。董洁认为应借助新技术新方法来深化和拓展研究新时代党的历史。

在研讨交流的基础上，大家一致认为，深化新时代党的历史与经验研究，是摆在党史研究者面前责无旁贷的重任，也是时代赋予党史工作者的光荣使命。深化新时代党的历史与经验研究，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从而为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提供思想启迪。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张太原、副主任李庆刚

主持研讨交流。中共党史高端论坛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精心打造的学术品牌，旨在为全国各个系统的党史研究者提供交流研讨平台。50多名专家学者、媒体代表和研究生参加了本届论坛。

作者：陈杰 来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网 2023-12-17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感受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实践

——北京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第65期中青一班赴门头沟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河北受灾较重的相关地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北京，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受灾较重的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水峪嘴村考察，希望乡亲们坚定信心，努力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11月14日，北京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第65期中青一班全体学员赴门头沟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在相关教师的带领下，学员来到王平镇安家庄村，沿途察看村庄沟道、房屋、基础设施损毁、恢复重建施工等情况，由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素芳同志介绍受灾房屋、基础设施修缮重建情况；在村礼堂观看《暴雨后相逢》视频资料后，由李素芳同志讲述暴雨后村民救助滞留旅客的感人故事；观看《门头沟灾情》视频后，听取区委党校教师介绍在防汛抢险中牺牲的刘捷、熊丽烈士先进事迹和门头沟区灾情总体情况以及防汛抗洪救灾意志品格；最后，学员来到大台街道落坡岭社区，实地察看社区拟拆除重建相关工作情况。在现场，一直坚守防汛抗洪救灾一线的社区党支部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孟二梅同志，为大家介绍拟拆除重建工作方案，讲述带领干部群众倾囊相助，让滞留旅客妥善安置、平安转移的感人故事。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不仅是一次了解门头沟区受灾房屋、基础设施修缮重建情

况的调研活动，也是一次学习新时代抗洪救灾英雄人物高尚意志品格的党性锤炼，更是一次感受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北京实践的生动课。

为了更好地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在北京的生动实践，北京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创新开展“三个一”教学模式，即一次理论课、一次领导座谈、一次实地考察，从而贯通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抓好系统学习和能力提升。北京市委党校（行政学院）与门头沟区积极联动，推动《“落坡岭‘不落魄’，安家庄‘能安家’——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北京实践”》现场课程开发，和“以人民为中心”为主题的讲授课程、学员讲台形成教学闭环。

下一步，北京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将不断打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北京生动实践的系列现场教学点，形成精品教学路线，更好地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走深走实。

来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网 2023-11-17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要闻

11月6日，新加坡卫生部常任秘书陈英杰率新加坡常秘访华团一行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访问，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出面会见，并主持与访华团的座谈交流。

11月6日至16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龚维斌率团访问埃塞俄比亚、南非、阿尔及利亚，取得系列积极成果。

11月7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毅会见来校（院）出席第四届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高端智库论坛的巴西前旅游部长福鑫。李毅欢迎福鑫出席论坛。他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的“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重点介绍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历史沿革、主要职能、对外开放办学情况。

11月7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谢春涛会见来校（院）出席“文明交流与全球发展论坛”的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夫。谢春涛欢迎罗塞夫来校（院）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11月7日，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日报社共同举办的第四届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高端智库论坛在京召开。来自联合国以及美国、英国、巴西、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政府官员、知名专家学者与国内智库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展开深入研讨。

11月7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谢春涛会见来校（院）出席“文明交流与全球发展论坛”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约翰·桑顿。谢春涛欢迎桑顿来校（院）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11月7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

京大学、中国日报社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高端智库论坛在京举办。

11月7日-9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成功举办“文明交流与全球发展论坛”。来自30多个国家的政要、企业家、智库专家、学者、文化名人和驻华使节等各界人士约150人，汇聚在这里，共话文明交流与全球发展。

11月8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主办的“中国—中亚现代化发展与领导力建设”论坛在北京顺利召开，这是首届“文明交流与全球发展论坛”的分论坛。来自中亚各国国家行政学院的院长、知名专家学者与中方的官员、知名专家学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师生共计100余人与会。

11月8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主办的“中阿文明交流与现代化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此次论坛是首届“文明交流与全球发展论坛”的分论坛。与会专家在论坛上表示，文明交流是贯穿中阿友好合作的一条主线，中阿两大文明的交流合作有坚实基础。

11月19日至23日，香港特区政府政治委任官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在国家行政学院成功举办。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谢春涛为研修班讲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会见学员代表、出席结业式并为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11月27日，丹麦驻华大使马磊一行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座谈交流，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主持交流活动。

11月27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毅会见来校（院）访问的越南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黄福林一行。李毅欢迎黄福林一行来访，他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

祝大会上提出的“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重点介绍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发展概况，并简要回顾了与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的交流合作情况。

✚12月1日，伊朗驻华大使巴赫蒂亚尔一行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访问，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出面会见。

✚12月5日，越南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副院长杨忠意率越共中央组织部考察团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访问，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出面会见，并主持与考察团的座谈交流。

✚12月8日，西班牙驻华大使拉法尔·德斯卡亚一行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访问，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出面会见。

✚12月13日至16日，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司法部联合举办全国律师行业党组织书记培训班，通过视频直播形式对全国律师行业党组织书记开展培训。

✚12月15日，土耳其驻华大使伊斯梅尔·穆萨一行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访问，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出面会见。

✚12月16日，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主办的第三届中共党史高端论坛——“深化新时代党的历史与经验研究”理论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出席并致辞。

✚12月18日，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中国应急管理创新论坛（2023）暨中国应急管理学会智库论坛”在京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中国应急管理学会具体承办，主题为“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得到了国家社科基

金资助。

12月26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谢春涛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老挝国家政治行政学院院长、人民革命党中央理论研究会副主任普冯·温坎显一行。校（院）务委员会委员、办公厅主任张忠军参加会见活动。

11月15日，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校（院）委会会议，专题学习《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和《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校（院）委成员、派驻纪检监察组相关同志参加会议。

11月15日，重庆市党内法规教育培训基地揭牌仪式在重庆市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邹勇、重庆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长（副院长）谢金峰共同为培训基地揭牌。

11月18日至19日，由京津冀党校（行政学院）联合主办的京津冀党校（行政学院）学习宣传习近平文化思想研讨会在天津市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陈远章，天津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徐瑛出席会议并致辞。

11月22日，北京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校（院）委会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和《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副校长（副院长）袁吉富主持，校（院）委班子成员出席会议。

11月22日至23日，2023年浙江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教学改革研讨会在浙江湖州召开。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陈柳裕出席会议

并讲话。

11月25日至26日，由河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主办的中国式现代化河南实践研讨会暨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第一届经济学科学术年会在河南省鹤壁市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河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长（副院长）、党组书记张涛，河南省鹤壁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洪利民出席会议并致辞。

11月26日，江苏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在无锡召开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第十七届科研协作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教育培训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重要论述，强调党校（行政学院）科研要坚守党校初心，坚持党校姓党，强化问题意识，奋力推动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科研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贡献力量。江苏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长（副院长）杨明出席并讲话。

11月30日，浙江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全面从严治党能力培训教学提升工程现场推进会在温州召开。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陈柳裕、省纪委监委驻省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组长周鲁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12月8日，上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校（院）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精神，落实上海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全市领导干部会议部署。校（院）委会副主任、常务副校长（副院长）曾峻主持会议。

12月15日，“红色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理论研讨会在安徽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副校长（副院长）潘理权到会致辞，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属高校，省、市党校（行政学院）相关专家学者60余人参会。

12月15日，福建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2023年科研协作会在平潭

召开。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刘大可出席会议并讲话，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何杰民参加会议。

✚12月21日，安徽省委书记韩俊赴安徽省委党校（行政学院）调研，并主持召开智库专家座谈会，就做好经济工作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提升智库研究水平，充分发挥智库作用，努力打造党委政府离不开、用得上、靠得住的“思想库”“智囊团”，为打造“三地一区”、建设“七个强省”提供重要智力支撑。省领导张韵声、费高云参加。

✚12月23日，为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发挥系统优势，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2023年度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浙江外宣好故事”英文宣讲交流会。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部、中央对外联络部国际交流中心、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浙江传媒学院等单位领导专家参会指导。

点滴悦读

《周易》治世思想的重重境界

《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典籍，其丰富的人文思想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既往《周易》的研究多从哲学维度入手，对其阴阳辩证的思想进行阐述，人们或将其视为卜筮之书，而无视其精深的哲学表达，或将其视为儒家经典，而将其思想体系的阐释局限于儒学视角。正是由于上述观点对《周易》多有误解，使得我们今天有必要重新审视《周易》的思想体系，关注《周易》之中对于人性的表达以及由此而呈现出的社会治理理念，梳理其思想内涵中的“德治”与“法治”社会治理理论架构，进而为构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体系提供智慧支持。

—

关于社会治理，《周易》所提倡的思想主线在于“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这意味着《周易》的治理思想是以天道为核心。

《周易》的天道理念从根源上而言，既脱胎于传统筮法体系又有所突破，其对天道的定义趋向于“易与天地准”，这种认知包含两个层次：其一是突出天道对现实社会与人生的客观约束；其二则是强调了天道的可知性。由此出发，中华文明所倡导的“天人合一”本质上在于谋求天道与人道相互之间的契合，通过对天道自然的认知以及契合于天道的行为，最终实现天人之间的和谐。由于这种契合的前提在于天道之客观性与可知性，由此中华文明强调“天人合一”的根本在于认知与顺应天道，而非力图改造天道自然。

从历史发展来看，这种治世理念的价值首先避免了将天道上升到类似神明式的存在，从而完全丧失人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从先秦到汉代占筮学说的发展中，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占筮中“神”的比重有所下降，而“德”

的关联则显著上升，在《周易》看来，人可以“德”而“知天”。正是这种“知天”中所包含的“治天”诉求，使得中华文明并没有走向宗教国度，而是在治世的过程中不断求索，力图更好地把握天道。

与此同时，在《周易》看来，尽管我们可以有效认识天道，把握天理，但是这种不断求索的行为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消解乃至改造天道的客观性。《周易》认为天道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意味着对天道的理解与天道本身的差异会伴随着上述变化恒久存在，故而《周易》对天道的理解是因顺多于改造。在《周易》看来，只有做到了“与天地合其德”，方可称之为“大人”，因此能否掌握与顺应天道，恰恰是《周易》之“治天”思想的关键所在，而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始终能够在名教与自然中保持一种大致平衡，其根源就来自于上述思想。在当今社会，这种“治天”的思维模式一方面可以引导我们不断探索自然，从而科学理性地去审视客观世界，另一方面则可有效避免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之中。

二

关于《周易》的思想属性研究，既往成果的特点在于出发点较为单一，即将《周易》视为儒家的经典。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实际上在早期是作为独立学术派别而存在的，其伦理思想对后世的儒家影响较为深刻。同时，儒家与《周易》的相互结合也丰富与完善了各自的伦理价值体系。但整体而言，儒家与《周易》所秉持的观念并不完全相同。先秦儒家在伦理上重视性善，进而强调德性教化之贡献，据此形成了“德治”的治世理念。与其迥然不同的法家在伦理上重视性恶，强调严刑峻法之约束，据此形成了“法治”的治世理念。《周易》虽言性善，但其不同于儒家之处在于，其指引性善的方略是“德治”与“法治”相综合的一条路径。与儒家相

比,《周易》更重视规则,特别是在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上,儒家对此的表述是以德分之,《周易》则是以位定之。与法家相比,《周易》将“善”视为人性之本源,即人之为善乃至最终成就善,根源在于人之有向善之本能,这种本能不仅使得人区别于禽兽,更使得其在建立社会规则的过程中,同时注重了扬善与止恶两个维度。因此在《周易》视域下的圣人,既注重“理财正辞”进而导人向善,亦强调“禁民为非”进而防微杜渐。

从这种社会治理思想出发,《周易》认为伦理上的美德必须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相统一,即以德配位,且君子之德与小人之德各有差异。这种伦理模式的重点在于将德性区分为基本伦理与职业操守两个层面。即自小人至君子皆要遵循的社会基本伦理,与有位君子才需要恪守的职位德操有所差异。

《周易》的这种“伦理与治世”的思维体系在今天的社会人际关系中有着较为重要的现实价值,其对基本伦理与职业操守的划分相较传统的儒家伦理体系更为合理,在社会上广泛推广的可行性亦更大。当今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崭新的社会环境需要社会治理理念的与时俱进。当今社会一方面以法治为准绳,从而约束每一位公民可以在统一的标准之上约束自身的行为;一方面以德治为目标,引导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可以在“举而措之天下之民”的理想中实现自身进步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这种社会治理可以说与《周易》所倡导的伦理观念是非常契合的。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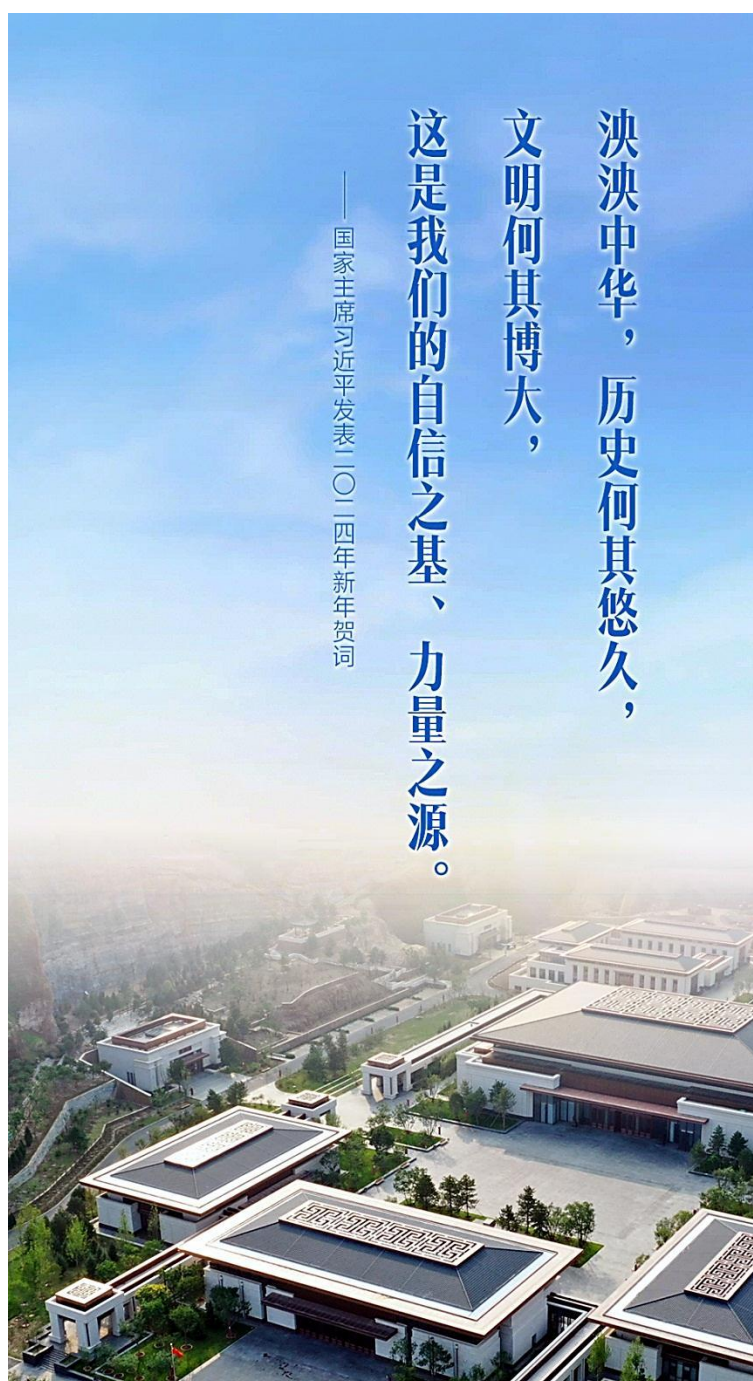
如前所述,社会治理理念与人性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周易》所主张的性善论与孟子所主张的性善论有所不同,是一种基于自然的性善论。其理论有以下几个关键点:其一是人性的源头来自上天,上天赋予人与万物相同的善。因此,人之向善是一种天赋,且人之向善的规范在于外在天道,从而

确立了“天人合一”是人之为善的终极目标；其二是人性虽本善，但却必须通过后天方可觉醒成就实然意义上的善，而动物等无觉醒之可能。由于人与万物有同源之善，使得人在参赞天地化育中促成万物“知至至之，知终终之”成为一种可能，但同时又使得人脱离万物而成为具有特殊性质的存在。从上述两个特点我们不难看出，《周易》的性善论在相当程度上认为“善”的形成与外在条件息息相关，“善”不仅依赖外在源头，并且通过外在条件得以完善。这与《周易》在思想根源上受到筮法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是这种性善论并没有全然忽视人的自觉性，与之相反，《周易》对人的特殊性进行了定义，即人对善的觉醒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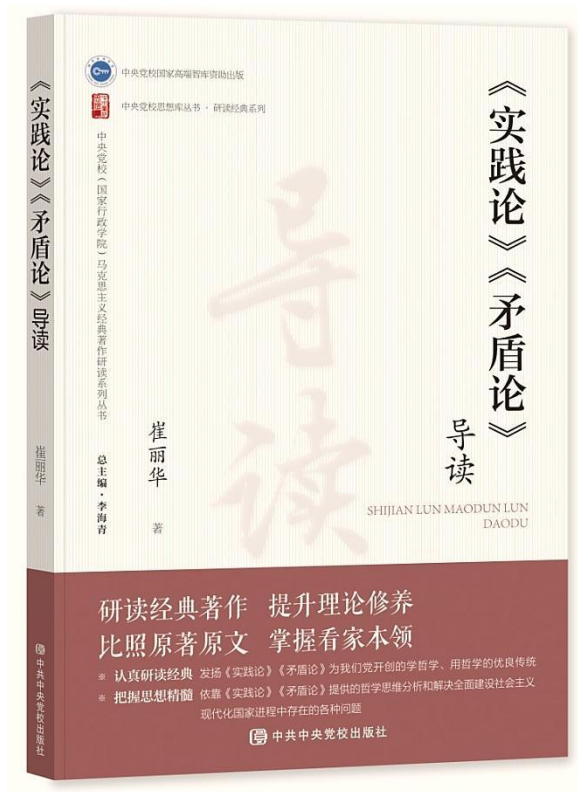
正是由于这种善的天赋外来，使得《周易》对自我的自觉表达呈现出一种以学习感悟为主的方式。正如《易传》中所言“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周易》对人之自觉的路径定义虽并不唯一，但其源头却是一致的，即“继之者善”。外求的功夫修养客观上要求将个人修养的提高与外界环境的认知联系在一起。因此《周易》所提倡的自觉以“穷理尽性”为前提。穷理强调对客观自然环境的充分认知与准确把握，尽性强调对内心自觉的全面觉悟与合理表达。个人自觉最终服务于社会治世的形式在于见仁见智者以君子形态引领百姓达成一种和谐。从个人自觉的境界而言，“君子”指向了一种近乎完美的人生态度。在《周易》看来，只有通晓天地之道，顺化万物之德，外承人物之义，内明良善之理的人，方可称之为“君子”，而君子的行为除了自修个人品德之外，更需要引导社会大众正确处理天人之道，从而和顺天地之化育。通过分析个人自觉与君子行为之间的逻辑演进，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感知具有《周易》特色的君子形象及其现代价值。

整体而言，《周易》的治世思想分为“治天”、“治人”与“治心”三个层次，不仅探究了不同层次之下“自我”概念的多维呈现，更重要的在于立体展示中华文明视域下的宇宙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可以说只有正确把握了《周易》的治世思想，方可谓知《周易》。

作者：刘震 来源：《光明日报》2023-10-09



图书推介



《实践论》《矛盾论》导读

作者：崔丽华

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23 年 6 月

【图书简介】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之作，《实践论》与《矛盾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的融会贯通，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境界，为认识 and 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提供了科学的、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实践论》《矛盾论》出版以来，人们纷纷阅读学习这两篇经典著作，从中汲取思想和智慧。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发表 86 周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特推出《〈实践论〉〈矛盾论〉导读》一书。

作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同时也是 2018 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央党校思想

库丛书·研读经典系列”的再版图书，本书从毛泽东创作《实践论》《矛盾论》的多重背景入手，详细梳理了《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脉络，分析了《实践论》《矛盾论》的结构内容，并对《实践论》《矛盾论》在新时代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展开了详细论述，同时，又结合作者近年来围绕《实践论》《矛盾论》进行教学和科研时所形成的新认识和新成果对全书予以了充实和完善，还新增了《实践论》《矛盾论》原文，作为附录方便广大党员干部对照学习使用。

当前，全国各地各部门正结合实际，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如火如荼展开各项调研工作。重读《实践论》与《矛盾论》，深刻感悟其中所蕴含的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辩证的观点，避免片面性，切忌以偏概全；深入理解如何坚持对立统一的规律，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重要论断，对于当前广大党员干部深刻理解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科学掌握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练好调查研究的基本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